

深化孫中山研究之“我見”

〔日本〕深町英夫（撰） 張玉萍（譯）

若對以往孫中山研究所採取的方法進行簡單分類的話，則可通過下述兩組對比關係做出解釋。

第一組為探討孫中山主觀方面（其追求的是什麼）的思想史研究與重視孫中山客觀方面（其進行的是什麼）的政治史研究所進行的對比。研究者經常指出這兩者之間存在著不整合，即在孫中山身上發生了理想主義思想和現實主義行動的乖離（例如以讓渡利權為交換條件獲得列強援助）。第二組主要是以孫中山個人為對象的微觀研究與考察革命勢力的整體結構及其在整個時代和社會中所處的地位這種宏觀研究所進行的對比。此兩組對比關係相互之間並非毫無關聯，筆者欲將兩者聯繫起來進行如下探討：

首先，在思想史研究方面，通過對三民主義等思想所表明的各種文本進行理論性分析，可以瞭解到孫中山個人的思想歷程及與其他思想家之間相互影響的關係，並可將其置於中國近代思想史的系譜中。但是，在此過分追求表面上的邏輯系統性與整合性，則往往會出現無視孫中山各種不同的話語（文本）在其原來語境中所具有的特殊性和相對性，從而將文本視為絕對的經典。毋庸諱言，孫中山不是書齋中的學者、思想家，而是作為一個徹底的革命家倡導理論和理念的人物。因此，他的思想和理論並非是抽象的、超越歷史的一般命題或定言令式，而是在不同的具體歷史狀況下才具有意義的特殊命題與假言令式的一種政治性話語。

孫中山的文本，不僅有論述普遍原則或長期戰略的一般性綱領，亦有應付特殊情況的短期戰術性的言論，其發表的語境極其繁雜。如果忽視這些不同文本之間在性質上的差異，僅用純粹的思想史研究方法來重新完整地勾畫孫中山的思想和行動之間的關係，是非常困難的，而且也無法解釋清楚上述思想和行動之間的乖離。此外，將研究對象只限定於孫中山個人（或極少數思想家），亦會出現將其性格等同於革命運動整體性格的問題。在極端的情況下，其結果則是將革命史描繪成追尋孫中山個人之思想歷程的一部小說，或者是孫中山逐漸尋找到“正確的革命”的過程。

毋庸諱言，革命運動絕非是由孫中山個人或少數革命領袖單獨進行的。其中有各種各樣的社會集團、革命勢力抱著各種主觀意圖參與進來，正是在這種大背景下，孫中山的思想作為指導理念發揮了作用。此外，革命這一非日常性的政治現象，對於日常非政治性的大多數歷史主體來說，具有何種意義，亦即在革命史以外的歷史展開過程中，怎樣評價孫中山的革命運動，只用思想史的研究很難找到答案。

另一方面，在政治史研究中，通過詳細考察以孫中山為首的各種人物的行動，關注他們與哪些個人、集團、勢力之間保持著何種關係，亦即通過考察各個實際的政治行動，由此再現歷史的

展開過程，而對貫徹在這些行動中的理念（或表達理念的文本）的自律性持有較為否定的態度，從而忽視了各種文本在連接各種政治行動上所起到的作用。此種方法與思想史的方法相比，因研究對象並未限定於孫中山個人，而是將孫中山的革命運動放在共時的大範圍內，故如前所述的與理想主義思想相矛盾的現實主義行動，在某種程度上得到了完整的說明。

但是，如此通過個別行動解釋所有現象的方法，即使能夠推測出考察對象進行個別政治行動時的微觀性和戰術性意圖，即何為其行動的直接目的，但並不一定能夠闡明貫徹於這些行動中的宏觀性和戰略性意圖，即何為這些行動的終極目標。在極端的情況下，用純粹的政治史研究方法描繪出的孫中山，成為缺乏具體的特殊性和連續性，僅是只顧眼前利益而玩弄權謀術數的、抽象的、機械論的“權力素”。不用說，此種方法與純思想史的方法在相反的意義上同樣也是片面的、不充分的。

當然，最好的研究方法是將思想史的方法和政治史的方法適當地結合起來，將孫中山這個微觀的個人置於宏觀的、共時的大視野內，並且探尋通時性的變遷。因此，筆者認為，以“為了動員的宣傳”為考察視角的方法是很有效的。即將孫中山的諸文本，視作其為了動員各種各樣的個人、集團、勢力而與其進行的“溝通”。思想絕不是能從時代的語境中隔離出來產生的，而是在廣義的社會上成為語言流通的一部分。若將思想的話語視作動態的“流通”（不是作為靜態的“庫存”）並對其加以分析，它則作為“溝通”表現出來。這意味著思想不是由思想家個人完成的“封閉系統”，而是在歷史與社會中，無論在通時上還是在共時上都不會完成的“開放系統”。換言之，思想體系被認為是從時代、社會的多元要求中提煉出來的“結晶”，而作為思想家的個人則被認為是那些信息流通系統中的連接點。

作為此種嘗試，2011年筆者在紀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時，編譯了由岩波書店出版的《孫文革命文集》。該書的構成是將孫中山多種多樣的文本按時間性進行排列，幾乎涵蓋了其革命運動的全部過程，因此具有在可能的範圍內凝縮孫中山革命生涯的言行錄的性質。該書不僅收集了孫中山的主要著作和革命黨章程等基本文獻，還收錄了在一般的著作集中未曾被納入的函電、演說、談話、命令等，這些未必在思想上具有重要意義，但其如實地表達了孫中山革命運動的實際狀態。

在編輯該書時，筆者試圖描繪出孫中山在其革命運動的各個階段，對何種人物、集團、勢力使用何種話語謀求支持的鳥瞰圖。筆者認為應該對發表各種文本的語境進行說明，因此附上了頗為詳細的解題和譯注。孫中山宣傳動員的對象，首先是會黨、華僑、留學生，然後是軍事領袖、國會議員，繼之是青年、工人、農民，即隨著時期的不同逐漸發生了變化或者擴大，以各種人物、集團、勢力為宣傳動員對象的孫中山，採取的完全是一種見人說法的方式。如其在中國同盟會時期提倡的三大主義、五權分立，是主要針對東京的中國留學生而言的，而對華僑或會黨，則幾乎未曾宣傳過這種抽象的革命理論，此即很好的例證。另一方面，孫中山一貫謀求外國當局、民間人士的支持，因此其對日本人提倡亞洲主義，對美國人則提倡民主主義或基督教，而對蘇聯人則提倡反帝國主義，其選擇倡導的是自己與對方可以共享的理念。

另外，孫中山創造、補充新的思想時，未必修正、放棄過去的思想。例如，對於從革命運動初期一直提倡的“平均地權”和最晚期提出的“耕者有其田”的關係，他並未進行詳細的解釋，而將其擱置了下來。其結果，孫中山思想無論是在共時上，還是在通時上，猶如滾雪球般地膨脹起來，包容了極其繁雜多樣的各種要素。《三民主義》演講則是如此多種多樣言論的最小公倍數（不是最大公約數）。

但是，筆者絲毫沒有認為孫中山在不同場合隨意提出的即興的、不合邏輯的言辭，是為了自己獲得權力的目的；相反，他是以一種令人驚異的、堅強的信念和意志，自始至終不斷地追求其唯一的目標，一語概之，即“恢復中華”；甚至可以說有時出現的相互矛盾的各種言論，均是為實現此一目標的手段和方策。在此意義上，孫中山的革命運動是“一以貫之”的。

另外，筆者認為日本的孫中山研究，無論在數量上，還是在質量上，都處在僅次於中國學界的研究水平上。特別是自1967年至2005年在東京活動的辛亥革命研究會，以及自1982年至今仍在活動的在神戶成立的孫中山研究會，兩個學術團體均展開了積極的研究活動。這兩個團體的會刊《辛亥革命研究》和《孫中山研究》，以及作為日本孫中山研究先驅的野澤豐先生（1922～2010）創刊的《近鄰》，成為學者們發表研究成果的重要平台。在該書的撰寫過程中，筆者充分利用了這些豐富的研究成果，從這些在世界上值得自豪的日本的高水平研究中，筆者獲益匪淺。

但是，對於日本以往的孫中山研究，坦率地講，筆者仍有不敢苟同之處。這並非只是日本一國的現象，亦非只限於孫中山研究，而是在研究外國的人物或事件時，學者的研究態度只是一味關注其與本國的關係。表現在孫中山研究上，即是研究過分集中於孫中山與日本的關係，對此筆者表示疑問。日本對於孫中山來說，確實是極為重要的存在，日本學者應當發掘、利用散落在日本各地的史料，並將其研究成果面向世界發表出去。但是，如前所述，孫中山是一個宛如十一面觀音式的人物，若只將焦點聚集在其中一張面孔上，則將看不到孫中山的真實面目。故此，筆者在該書中將孫中山與日本的關係看作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並試圖從其內面描繪出孫中山的完整形象。願以此得以深化孫中山之研究。

（作者係日本中央大學經濟學部教授，譯者係日本東京大學綜合文化研究科・教養學部講師）